

经济学名家随笔

驻足边缘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bamboo branches in dark ink, with a large, glowing yellow sun or moon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ranches. The overall tone is warm and artistic.

党国英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943

7-53
223

经济学名家随笔

驻足边缘

党国英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驻足边缘/党国英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10

(经济学名家随笔)

ISBN 7-211-04221-4

I. 驻… II. 党…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1927 号

经济学名家随笔

驻足边缘

ZHUZHU BIAN YUAN

党国英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

(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编: 350003)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0.75 印张 4 插页 213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11—04221—4

I. 106 定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把发表过的一部分文字再结集出版，从我这方面来说，是相信这些文字还有人愿意读。出版社的热情更使我相信这一点。1998 年以来，我在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近 200 篇，选出不到 100 篇收入这个集子，应该是负责的、尊重读者的做法；放到一边的是一些专业研究文字和一些应景之作。

从心里说，我希望我的文章能被当今大学生读到。这些年来，我越发体会到学者对于同时代的政治家的影响很小，当然对政策调整的影响也很小，这不是因为学者的意见都不重要，而是因为一项政策的出台受利益关系的影响太深，也受政策实施机制的制约很大。在社会生活多元化的情况下，高层决策者（不要把“高层”理解为几个人，应该包括为他们服务的整个机构的高级人士，大量的信息是经由他们过滤、加工以后才送到最终决策手里）的智慧、理念、知识结构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就要对他们自己发生影响。但决策者的智慧、理念和知识结构又与决策者过去所受的教育有密切联系。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以为对青年的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再具体说，中学和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设置是非常重要的。

可我常常对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心存忧虑。不用说，中国理工科的学生容易产生“设计”社会、“改造”国民的思想，而这与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是不甚相容的。文科学生呢？他们除了有理工科学生一样的思想以外，还常常很清高，他们本来是大众的一部分，但几年学习下来，就不会面对大众说话了。大学的

哲学课程和一些工具性的课程“害”了他们（至于一些明显脱离中国实际的所谓公共课程，大学生们并不会相信它，这种课程容易造成大学生的逆反心理，让他们产生激进思想）。从“功用”的角度说，大学生对工具性课程的学习能起到一个接受选拔的作用，而良好社会的条件之一是有效的选拔制度。然而，把为选拔服务的知识加以神化，误以为它对解释社会无所不能，就变得有害了。我赞成一部分高智商的人士继续在一定的知识领域做“游戏”性的研究，也赞成一部分大学生能继承他们的职业，但如果这些先生和学生独步天下，还鄙薄积极思考社会现实问题、向大众说话的人士，恐怕就不可取了。目前中国大学是有这种倾向的，虽然我们的“游戏”性研究相比之下还做得远不是很漂亮。

发育良好的社会是“精英治国”，这种说法大体不错。这不排除其他领域也需要精英的参与，更不是说“精英”治理下的人士都是碌碌无为之徒。“精英治国”体现一种社会分工，让那些有志于公共事务、精力充沛的人去做国家的政务员、公务员，其他人做他们感到有趣的其他事情，真是各得其所。如果这种分工通过某种竞争方式产生，而不是被人“设计”出来，大概更靠得住，更有效率。治国“精英”主要出自大学生，但如果他们带着“设计”社会、“改造”国民的理念去做治理国家的准备，或者把智力游戏的成果作为治理国家的圭臬，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正是顾及于此，我想到了学者所要做的事情。既然不能也不愿以“游戏”性的研究为生，同时又不大能影响当今的国家事务，何不与大学生们对话，通过他们影响社会的未来？

学者是一种服务工作者，而最有意义的服务是教育。可是，人们并不都这样看。学者与大众之间存在隔膜，而且隔膜还很厚。在专业化分工的社会里，各行业人士之间都存在隔膜，为什么只有学者被套上神秘有时甚至是尊贵的光环？我想是大众对学

者的生活更不理解。在一个电工和一个炸油条的师傅之间，也会有隔膜，但相互之间的理解在顷刻之间。一个粗通文墨的人士对学者的理解要困难得多。学者不用劳动，却出入“庭堂”，乃至拜将入相，全无衣食之忧，这在一般大众看来的是难以理解的。要完全消除这种隔膜没有可能性，但我以为学者们应该知道自己的斤两才行。可事情好像不是这样，某些学者有自我神化的倾向，好像他们对大千世界了然于胸，可把古今未来之事尽在笔下安排妥帖。这样，学者就不是教师，而是先知了。

写下上面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自己的治学与写作设置一个路标，同时也为读者对这本书的批评提供一个参考标准。我的文章常有一些他人言所未言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的“正确性”我是不敢打保票的，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正确思考、正确表述。别人还可能提出这些东西的“学术性”问题，对此我也有话要说。这本书里的文字都算不上严格的学术讨论文字。所谓学术讨论，最重要的是用可靠的逻辑来证明某个判断，而这个判断可能没有被别人证明过；或者也可以是用新的证据来否定一个判断。所谓“可靠的逻辑”，莫过于数学公理，思考中的瑕疵与逻辑链条的断裂容易被数学推理所发现。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荒谬与残忍并不是因为人们在数学上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常识和良知上出了问题。还有，许多判断早已被证明，但人们对它却可以熟视无睹，继续犯着愚蠢的错误。难道对这类愚蠢、荒谬和残忍，我们需要用数学来证明吗？我对复杂的经济数学的看法是，它对于选拔解决社会问题的人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本身没有重要意义，至少在目前中国是这样。

我写了不少关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文字，但在这个集子里几乎没有收集。普通农民的境遇令我伤感，我不想把关于他们的话题与其他话题搅和在一起，但在这里不妨谈谈我在农村问题研究

中的感受。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萦绕于我胸中的是一种困惑。具体说，是对农民权利保护之难的困惑。农民权利的改善举步维艰，当然会大大影响农村经济的效率，影响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我们的现代化经过漫长的过程，在权力和资本的引导下，将会有一个成熟的形态，那时，农民问题将改换内容，农民经过一番洗礼，蜕变为各个现代社会阶层，这也许是最好、最可能的结果。对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学者能做什么？是的，我们会对眼前的过程做出观察、解释，这是我们的本分。可是，如果只对这个过程的细枝末节做出观察、解释，而置基本问题于不顾，能算得上诚实吗？我会以其他方式更多、更努力地表达我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看法。

书里的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经济学本身的一些讨论，但多集中在方法论的层面上。第二部分的话题已经离开了经济学的传统领域，算是走到了“边缘地带”。第三部分是一些社会评论，读者会看到，用经济学的眼光来审视社会问题会与一般媒体的社论显著不同。第四部分是我在其他领域的一些一得之见，算不上什么学术讨论，但也不至于被看做信口开河。最后一部分是我的一些读书评论，近几年写了不少读书评论，收在这里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集子里的文章大部分首发在《南方周末》、《21 世纪经济报道》、《中国改革报》、《时代财富》、《经济学家茶座》和《书评周刊》上。这些报刊的名气有的在中国算不上最响亮，风格也各不相同，其共同特点是没有什么官派，也没有霸气和小圈子气。它们的编辑都是很敬业的，有的编辑还是学有专长并发表过大量作品的学者，我与他们的往来增长了见识，也得到了写作上的鼓励。我特别要感谢赵莉女士、郑扬女士、聂北英女士以及鄢烈山、詹小洪、魏海田、刘小垒、吴文尚、周明生和袁喜清诸位先

生，没有他们的长期支持，这里的许多文章是无法面世的。还有许多朋友给了我重要帮助，这里不一一提及，但心里对他们永存感激。这本书能够出版我很高兴。为此还要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好意，特别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陈艺静女士，她为本书的编辑提供了好的建议，并在许多相关事务中做出了辛勤努力。

党国英

2002年5月28日于北京西坝河

目 录

序 言

回首家园

- 2 驻足边缘地带
- 6 喜欢经济学的理由
- 12 经济学家与人文关怀
- 16 价值中立:经济学的软肋
- 20 经济学大堂的门票
- 29 从“哲学帝国主义”到“经济学帝国主义”
- 39 资本与劳动:谁是老板
- 44 学术商品的供应与需求
- 48 经济学思考的趣味
- 51 什么是好学风

风光无限

- 56 文化研究中的假命题与文化研究困境
- 79 谁来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
- 83 用制度弘扬美德
- 86 美德的价值有几何
- 89 道德批评的边界
- 92 对待动物的道德底线

- 94 家庭的产生与颠覆
- 105 家庭内部的交易
- 110 领袖问题刍议
- 114 关于领袖崇拜
- 118 政治领袖转变立场的奥秘
- 122 华盛顿总统为什么不寻求第二次连任

国是论衡

- 128 选择现实理性主义
- 132 弘扬知识界的现实理性主义
- 136 谁使我们彼此信任
- 140 守卫科学的边界
- 147 唤回敬畏之心
- 150 诚信的制度基础
- 153 经济学如何理解诚信
- 157 选举的意义
- 161 如何面对大众的政治热情
- 165 减少科学家的风险
- 169 降低穷人的生存风险
- 172 新世纪呼唤新社会理念
- 179 关于国情分析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边缘随想

- 188 与名家握手
- 192 学者生财
- 195 历史变迁的生物学秘密
- 199 士多官多孰为祸

- 202 袁中郎慧眼辨忠奸
- 204 从自行车积压谈开去
- 207 冒险做学问
- 210 王小波之死
- 213 “不识太行山”之忧
- 216 从拿破仑的选择谈起
- 220 高考之痛
- 223 美国国宝
- 227 扁平的足球社会
- 230 盛大节日
- 234 足球竞技全球化
- 238 足球的专制
- 242 心忧中国志愿者事业

边缘阅读

- 248 奥肯的自由言说
- 252 经济学拥抱生活
- 256 文明与烦恼
- 259 南方有位鄢先生
- 263 读书印象
- 268 “相国”之学
- 272 资本主义与人类命运
- 278 解读资本主义文明
- 287 撩开农村社会的面纱
- 293 宗法农民解放的狂想曲
- 307 民主理论模式之争的启示

- 313 找寻稳定发展的社会模式
- 318 找寻历史循环的终结点
- 327 读懂中国经济

经济学名家随笔

驻 足 边 缘



驻足边缘地带

马歇尔把“自然界没有飞跃”当做洪钟大吕之音，而他真正想说的是“人类历史没有飞跃”。改良主义才真正把握了人类命运的真谛，而改良主义所赞成的是一种对社会的边缘性调整。改良主义以悲天悯人的态度看待“暴力革命”，以为这种革命的真实历史意义是对不愿意实行改良的当权者的一种惩罚，至于通过革命而发生的幸运者和不幸者之间的角色互换，与历史进步无甚关联。亨廷顿把“革命”看成是“涉及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施政方针以及社会政治领导方面的迅速、完全和剧烈的变化”，这真太夸大它的社会功利意义了。这种“革命”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人类社会没有这样的运气；真正能够促进社会发生转变的是有序的、不断的改革，是持续的制度创新。

中国 20 多年的变革在边缘地带推进。国有企业由包罗万象的垄断控制，到“有进有退”方针的实施，给私营企业让出了越来越大的地盘。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体制由综合平衡的计划体制，到尊重价值规律，又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制度，一步一步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农村改革先是允许“包工到组”，继而允许“包产到组”，最后终于接受了农民的“包产到

户”。一切改革的“难点”在渐进改革中逐步化解。物价放开在 80 年代是不成功的“闯关”，而在 90 年代初竟不战而胜。城市住房改革先是寻找全国统一方案而不得正果，继而各大城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终于使这项改革在世纪之交平静地画上句号。城乡分隔的壁垒现在已经百孔千疮，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权利，看来也为期不远了。最难攻破的堡垒是政府对银行业和电讯业的垄断，但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这两个堡垒的攻破也不会让我们等待太久了。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显现多种可能性，我们正拭目以待。至于我们的意识形态，早已在一天一天变化，彼岸的港湾已经向这艘航船招手了。

要推动新制度边缘的扩大，不能画地为牢。驻足边缘，却背向外部世界，患得患失，故步自封，不仅将贻误前进的时机，还会招来“革命”的幽灵。历史学家朱学勤说得好，“但凡还能爬坡的地方，当然慎言革命……不过，革命一旦在改良的后面加快了步伐，改良一定要走得更快。”改良愈是要走得快，就愈要把握好改良的方向。为此，学者的良知与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一样重要，而学者的良知需要在不同学科的边缘交叉上得到培养。

人类关于社会的认识体系被分为不同的学科，反映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边缘，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愿意站在自己学科的边缘上向外张望。每一个学科都想扩张自己的疆域，但似乎惟有经济学获得了学科霸权。一个学科，其学派的数量与学科的成熟程度成反比。经济学几乎越

来越没有学派可言，于是，经济学家没有成名的捷径，经济学家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学科霸权就成了对经济学家辛苦的报偿。

经济学家不停地扩张自己的学科边缘，是经济学家狂妄自大吗？在 20 世纪初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中，就有人贬低政治学；到了 20 世纪末，竟仍有经济学家说关于国家的理论是一片空白！现代政治学家拿起了经济学的工具来挽救自己，但同时他也把自己变成了经济学家。至于社会学，那要荣耀得多，但一位做社会学研究的师兄说，20 世纪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三次较量，都以社会学的败退而结束。看一看人们所喜欢的科尔曼的社会学教科书吧，难道那不是应用微观经济学吗？说到历史学，我的敬重之心油然而生。但是，它一旦离开田野考古和文献考据，到理论层面上，就显出不足了。历史学缺乏统一的理论，历史学家之间难以深入对话。于是，有的历史学家喜欢经济学家诺斯，因为他那里有历史学家需要的理论。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东欧社会危机与东亚、东南亚经济危机，对社会科学的一大学科来了一场总检阅。当红政治学家亨廷顿曾说，苏联这个国家有一种包容各个民族的能力，结果苏联在 90 年代解体了。他又说，腐败“也许是克服阻碍经济扩张的那些传统法律和官府规定的一种办法。……反腐败……最终会带来和腐败本身类似的效果”，但不幸的是，东亚和东南亚的集体高层腐败是其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腐败的问题不解决，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好到哪里去？亨廷顿的嘴就像乌鸦嘴，夸谁谁出问题。还有“现代化”理论家把东亚的

模式概括为“政府主导模式”而予以肯定，又有“文化研究专家”（一种志向很高的学者）说“儒家文化”是东亚奇迹的原因。危机一爆发，各种宏论立刻隐身不见了。还是经济学家的坚定信念使他们不会被“浮云遮望眼”，许多经济学家曾否定东欧模式，不看好东亚经济前景。这两场危机使他们赢得了声誉，如克鲁格曼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然而，经济学的霸权并不那么稳固，它自身不足也显而易见。从历史上看，其他社会科学门类所产生的影响人类发展的大思想家人数，远远要超过经济学家。这些领域的当代学者，也做了大量令人叹为观止的工作。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Y.R. 斯特拉耶曾预测说，有的国家很快就将不成其为一个国家了。历史果然证明他是对的。经济学完全替代其他社会科学的条件远不具备，经济学家还要向其他领域的学者学习很多东西。知识的增进需要知识门类之间的碰撞，一种在学科边缘上的碰撞。这种知识增进将有利于加深对我们社会的理解，有利于明了我们社会前进的方向。

有活力的社会在边缘地带不断推进，杰出的思想在边缘地带继承和发展。

2000年2月